

「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

胡
德
坤

二十世纪初，日本发展成为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它实力不足，但野心勃勃，屡屡同美英争夺亚洲霸权。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向美英的亚洲霸权进行全面较量的起点，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面对着日本的侵略，面对着日本的争霸，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者不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惩罚侵略者，却实行了绥靖政策。绥靖政策企图用妥协、退让的方式在侵略者面前乞求“安全”；用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换取“和平”；用反苏为诱饵，引诱日本进攻苏联，以保持他们在亚洲的霸权。这种绥靖政策是对中国人民的出卖，是对日本侵略者的纵容，它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无穷的后患。

侵占东北 意在争霸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用武力开辟了侵略中国的道路。当时，正值欧洲列强你争我夺分割中国之时，日本作为欧洲列强的一名脆弱的小伙伴，小心翼翼地挤进了侵略者的行列。但是，正因为它是后起的扩张主义者，所以它对中国、对亚洲财富的贪婪欲望，它力图称霸亚洲的狼子野心，较之老牌扩张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者总是按照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和谋求霸权的。如果说，一九〇〇年，当帝国主义公开出兵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尽管日本出兵最多，但还仅仅只能在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中谋求分得一杯残羹剩汁，那么，一九〇四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则开始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的野心。在十月革命前，日本争霸的主要对手是沙皇俄国；而在这以后，它争霸的主要对手则是英美。十月革命前，在亚洲，美英主要是利用日本来牵制沙皇俄国，遏止俄国熊势力的发展；十月革命后，美英则是利用日本进攻苏联，遏止日本势力向中国内地发展，而保持他们在亚洲的霸权。

我国东北地区幅员广阔，矿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各资本主义列强早就垂涎欲滴，为夺取这块富庶之地而展开了狗咬狗的争斗。

一八九四年，日本不宣而战，打败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提出割让辽东半岛等无理要求，引起了俄、法、德等帝国主义的不满，不得不退出辽东半岛。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东北的分割竞争激烈起来。一八九六年，沙皇俄国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一八九八年，又强迫中国租

借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地区，并取得了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它步步进逼，逐渐排斥其它帝国主义的势力，把侵略熊掌伸向整个东北，大有独吞独霸之势。这就引起了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在英美支持下，一九〇四年，日军偷袭驻东北的俄军，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俄国战败，日本取得了南满铁路、旅顺大连港的租让权。

一九一四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利用西方列强忙于应付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机，对德宣战，占领了中国山东半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并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对此，美英虽然感到了日本的威胁，但无力阻止日本。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日本代表石井和美国国务卿蓝辛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石井——蓝辛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南满的“特殊权利”，但提醒日本不得独霸中国，必须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对各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这既是对日本的让步，又是对日本的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已在中国、亚洲夺取了空前的特权，经济上已超过美英等国而名列前茅(见表)。于是，美英大为不满。一当它们从欧洲战场脱身之后，便转身给日本一个回马枪。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次年二月，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了九国海军裁军会议和关于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前一个会议规定美、英、日的海军主力舰比率为五:五:三。后一个会议缔结的九国公约，否认日本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和“特殊利益”，日本所获得的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被迫交出，公约重申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是对日本独霸中国野心的当头一棒。

附：中国进口总额中，日、英、美所占比率

年 度	美 国 和 菲 律 宾	英 帝 国 (香港除外)	日本帝国 (包括殖民地)
1911—1915 年	8.9%	19.1%	19.7%
1916—1920 年	14.5%	15.1%	32.8%
1921—1925 年	16.7%	15.8%	26.9%
1926—1930 年	16.3%	14.9%	28.2%

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认定美英是它称霸亚洲的最大障碍，决心同它们决一雌雄。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就是日本这一意图的集中反映，它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争霸称霸的总纲领，其要点是：

一、谋求亚洲和世界霸权。

奏折说：“明治大帝遗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第三期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亚洲畏服于我。”“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这就是说，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扩张主义者就有了一份征服台湾、朝鲜、满蒙、中国全土及亚洲的侵略蓝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继承了这种扩张主义的衣钵，而且胃口更大，手伸得更长，妄图称霸亚洲乃至欧洲。

二、要称霸亚洲，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

奏折认为，日本称霸亚洲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它指出，“世界大战期中，美国曾和英国暗中勾结，一举一动都想牵制我国对中国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条约以来，我国向‘满蒙’的扩展事事受到限制”，九国条约的目的，“乃英美富国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势力。即军备减少案，亦不外英美等国欲限制我国军力之盛大，使无征服广大支那领土之军备能力”。因而，日本要称霸亚洲，“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

三、必须用“铁血”占领东北。

奏折认为，中国东北“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无其匹配。”用中国东北的铁矿和煤，可以炼出十二亿吨钢，使日本在七十余年间钢铁能自给自足。利用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使日本获得六百亿万日元的巨利。所以奏折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蒙’利权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来征服中国、亚洲、欧洲。因而，奏折把我国东北看作是日本侵略扩张的“第一个重大关键”，“是日本的心脏”，叫嚷“必须使用铁血”侵占东北。

四、在“反苏”的幌子下，侵占东北。

奏折写道：“我国首先应该以防止赤俄南下为口实，逐渐向‘北满’强行扩张以便攫取其资源，南面，要制止中国势力（主要指美英势力——笔者）北上；北面，要制止赤俄势力南下。”“同时，还要采取机密手段和赤俄合作”来对付美英势力。这就是说，“反苏”以麻痹美英，“联苏”以牵制美英，“击苏”以独霸东北，据东北以击美英。

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野心是称霸亚洲、直至欧洲；它认定争霸的对手是美英；它的策略是打着“反苏”旗号；它争霸的第一步是侵占我国东北。

一九二七年，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小银行纷纷倒闭，经济发生激烈动荡，法西斯势力逐渐抬头。日本统治阶级为了摆脱危机，决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加强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是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发动了两次反革命大镇压，使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一九二九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它很快蔓延到日本。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九，按月度计算，从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危机中的最低点，煤产量下降百分之三十六点七，钢产量下降百分之四十七点二，造船生产下降百分之八十八点二。在危机年代里，日本对外贸易，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六点五，进口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七。

为了摆脱危机，日本疯狂扩军备战。一九三〇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军费占整个国库开支的比例是：英国是百分之十四，美国是百分之二十一，法国为百分之二十二，意大利为百分之二十四，而日本竟高达百分之二十九，比英国高出一倍，居世界第一位。

为了一举侵占我国东北，日本一直在窥测时机。一九三一年，日本认为国际条件有利于它发动侵略战争：由于经济危机，美英等西方帝国主义者忙于应付国内事务，无力干涉日本；中国国内，蒋介石反动政府正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红军，忙于内战。于是，日本侵略者于九月十八日夜，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五天之内占领了吉林、辽宁的大部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它是日本同美英全面争夺亚洲霸权的开

始，标志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从而也就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名抑实纵 损人利己

日本进攻东北，矛头所向，直指美英在亚洲的霸权，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美、英、法等国却采取了绥靖政策，这是因为它们认为，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仅威胁到它们在殖民地的利益，而且也威胁到它们本身资本主义存亡的问题，因此，十月革命后，它们一直患着“恐共”病，充当着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它们用“苏联的威胁”来威胁自己的伙伴，限制它们的势力，夺取、建立和保持自己的霸权。日本的“反苏”叫嚣正中它们的下怀，它们最迫切的愿望是，支持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使其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其一。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法国拥有强大的陆军，而美国则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之间虽然你争我夺，但大体上分得了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势力范围。它们是既得利益者，极力维护已到手的利益。它们希望“和平”，也就是希望没有人来同它们争霸，这就是当时西方普遍蔓延着的“和平主义”。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战后，德、日、意等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实力逐渐增强，它们对现状不满，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就使得帝国主义间的争夺日趋激烈。面对日本的挑战，美英等国谁都不愿意公开与日本冲突，它们损人利己，用妥协、退让，去换取“和平”，从而把中国东北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美英对日所实行的绥靖政策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它们又各怀鬼胎，暗地打着自已见不得人的小算盘。美国希望日本进攻苏联，使日本削弱，以便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日本。美国同日本的贸易约占整个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如果日苏冲突，美国可以攫取更高的利润。美国又害怕中国革命力量的增长，希望假手日本进行镇压。美国总统胡佛曾直言不讳地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中国的秩序没有恢复，中国的领土有一半已布尔什维克化并且与俄国合作；……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假使他们公开地对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胡佛的意思很明确：只要日本进攻苏联，只要日本镇压中国革命，美国肯定是支持的。但是，美国又担心日本势力增强会影响它在亚洲的利益，又企图把它的势力局限在东北。这样，美国既害怕中国革命运动，又害怕日本势力的扩张，总想在这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一箭双雕的万全之策，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日本侵略的任何妥协、退让，便是有意无意地纵容、支持。事实上，在一九三一年，美国还把价值十四万美元的枪炮弹药，近六百万美元的工业装备品，七百万美元的钢铁，一千六百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而杜邦公司甚至把制造炸药的硝酸和氨的专卖权卖给日本三井公司。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一开始，美国就采取消极的绥靖态度，连中国政府提出要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也遭到美国的拒绝。直到日军于十月八日轰炸锦州，出现了“南进”的苗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于次年一月照会中、日政府，宣布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采取“不承认主义”的原则。但“不承认主义”仅仅是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表示不满，发发牢骚而已，它从无实际

行动，始终不过是一纸空文。尽管如此，美国还担心日本产生误会，在史汀生发出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照会的解释，声称“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州合法条约权利；二、不拟过问日本任何解决事件，惟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这就是说，只要日本侵略只限于东北，不向内地发展而损害美国利益，美国就不会干涉。解释还有暗示的话没有说完，那就是：你要扩大侵略，就只能“北进”。出卖中国东北，以引诱日本祸水“北进”，以此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这就是“不承认主义”的实质。

英法更是明目张胆地公开支持日本侵略。它们既希望日本“北进”攻苏，又希望日本与美国冲突，以削弱美、日力量。它们很早就想排挤美国势力，准备同日本一起瓜分中国：它们把东北划给日本，把华南划给法国，把华中、华西划给英国。英国政府代表在国联发言，公开为日本侵略行为张目，认为中国是一个“需要整顿秩序的”国家。英国垄断资本的喉舌竟胡说日本的侵略是“必要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还向英法订购了大批武器装备，法国政府还给日本八亿法郎的贷款。

受美英控制的蒋介石政府，完全秉承其主子的旨意，提出所谓“不抵抗主义”，即卖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要全国军民不要抗击日军，应“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对日军避免冲突。”十月间，蒋介石秘密派遣亲日分子许世英前往日本，向日本提出，只要日军不向中国本部十八省进攻，国民党政府同意把东北送给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反动政府，宁愿卖国，也要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同时，他可以集中力量镇压革命力量，围剿革命根据地。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总兵力不过万余人，而中国军队近三十万，只要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奋勇抗日，是完全可以击败侵略者的。但由于美英的绥靖政策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使得三十万东北大军一枪未放，拱手将东北送给了日本侵略者。可以说，我国东北是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

苏联看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玩弄的阴谋，为了不使自己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苏联政府宣布严守中立。但它从舆论和道义上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它一方面做好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向日本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这就击中了绥靖主义者的要害，阻止了日本祸水的“北进。”

中国共产党识破了美英绥靖主义者的卑鄙伎俩，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卖国主义行为，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要求“组织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斗争，组织游击队在东北同日军作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在敌占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英勇地同日寇作战。日本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美英帝国主义玩弄的绥靖政策，它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以疯狂的反苏战争叫嚣，使美英放心；以对中国“无领土野心”的虚伪声明，使美英安心。尽管日本政府与军部在对外侵略政策上有分歧，但它们的目的和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在行动上起到了刽子手和牧师的反革命两手的作用。日军每采取一次大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便默契配合，不惜以撒谎来欺骗舆论，为日军的侵略行为辩护。“九·一八”事变发生

后，九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反诬中国军队挑起了冲突，诡称“帝国政府在满州没有任何领土欲望。”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卑劣手法，竟得到美英的赞许。美国助理国务卿凯斯特认为日本的声明完全是“真诚”的。而由英法操纵的国联行政院经过数天讨论之后，作出的第一项决议竟这样说：“国联行政院承认日本政府关于它对东北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的重要性。”

但是，日本并没有按照美英的愿望“北进”。在日本看来，“北进”并不是它的目的，而是掩盖其“南进”的手段。十月八日，日军空袭锦州，使美英感到恐惧和忧虑。日本亦感实力不足，害怕过早同美英冲突，遂于十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第二次政府声明，重弹“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的老调，以稳定美英。

这时，日本相信他们的侵略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为了打下“南进”的基础，为了迷惑美英，十月下旬，决定向东北北部进军。日本这一行动深得美英赞赏：它们盼望已久的“北进”就要实现了，日苏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它们为此而高兴，为此而欢呼，正如一位美国政论家所描述的，“全世界都紧张地注视着远东事变，大家都焦急地期待与苏联的冲突得以爆发。”美联社驻巴黎记者在十一月十三日公开宣称：“全世界都应该感谢日本在远东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连美国驻国联代表道威斯得知日本占领齐齐哈尔的消息时，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兴高采烈地说：“事情进展得多么快啊！”

但是，绥靖主义者高兴得太早了，日本的目的是称霸亚洲，尽管它占领了东北，但既不感到无耻，又不感到满足。一当日军占领东北北部之后，便就此止步，不再“北进”，它借口“讨伐辽西一带土匪”，立即于十二月底挥戈南下，于次年一月初攻占了锦州。而当它攻占了全东北之后，认为实力已足，挺而走险，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突然袭击上海。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的推动，驻上海第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寇，才使日军死伤万余人，四易指挥官，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一·二八”事件是日寇以东北为基地“南进”的一次尝试。上海是美英对华贸易的中心城市，美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六十五都集中在上海。因此，“一·二八”事件打疼了美英，它们不得不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遭到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深感实力不足，时机未到，不得不同中国签订停战协定。

绥靖名作 满纸荒唐

“九·一八”事变以后，受美英法绥靖政策所制约的国联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无能为力，使人们大失所望。为了欺骗舆论，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才拼凑了一个以英国人李顿勋爵为首的五人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

当时，我国东北烽火连天，四千万同胞惨遭日寇铁蹄蹂躏，但李顿调查团并不急于去东北进行调查，首先到巴黎、伦敦、华盛顿，会见了美、英、法等国的要人，全盘接受了绥靖政策，才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动身前往远东。出发以后，李顿调查团不取道西伯利亚捷径，却先到日本，会见了天皇、外相币原、法西斯将军荒木等人，直到三月十四日才到达上海，四月二十四日最后到达东北。

在这期间，日本最后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对付李顿调查团，掩盖其赤裸裸地进行武装侵略的罪恶行径，日本导演了一出成立“满州国”的丑剧。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在沈阳召开了所谓“全满会议”，成立“满州国”，由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后称皇帝），一批大小汉奸当上了伪满的官员。这个所谓“满州国”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却要受日本关东军的指挥，伪满各级行政机构都由日本人掌握实权。伪满皇帝溥仪开始时还能同日本天皇称兄道弟，后来不得不把天皇尊为“父亲”。由此可见，明明是日寇用铁血占领了中国东北，却硬说是中国东北“独立运动”的结果；明明是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傀儡，却硬要贴上“独立主权”国家的标签，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但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不要脸的人。

伪“满州国”的成立，意味着在中国东北“开放着的门户”从此关上了。它严重了损害了美英在华利益，但美英仍然采取委曲求全的方针。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写成，十月二日正式公布。该报告书一公布，便赢得了西方绥靖主义者的一致喝采。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认为它是“明白清楚而令人信服的”。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为什么受到西方绥靖主义者的赞扬呢？还是让我们剖析一下它的内容吧！

该报告书的要点是：

一、混淆侵略与被侵略的区别。报告书一再把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说成是“中日冲突”，报告书建议东北“自治”，中日双方都要撤出东北。要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退，岂不是咄咄怪事？报告书甚至无理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办法以禁止并遏抑有组织之抵制日货运动”。受到日本侵略，还不能反侵略，连抵制日货都不能容许，报告书为谁张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二、鼓吹“共产主义的威胁”。报告书写道：“从苏联输入的共产主义的传播应该认为是基本因素之一，而这些因素在研究满州问题时是必须予以注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事实上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手”。它不仅威胁到国民党政府，而且也威胁到美英，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报告书鼓吹的这种反苏反共谬论不仅承认了日本侵略的“合法性”，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找到了“根据”，而且也是号召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来反苏反共。

三、牺牲中国东北，将日本祸水北引。报告书不得不承认伪“满州国”是日本刺刀保护下的傀儡政府，但同时又建议不必恢复原状，并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报告书真实地反映了西方绥靖主义者的这样一个愿望：为了自己的利益，谁也不愿冒同日本作战的危险，都力图牺牲中国东北，来鼓励日本“北进”。这正如李顿日后在伦敦的演说中所供认的：“现在的问题不在强迫日本撤出满州，而是要创造容许日本留在满州的条件。”

四、用“门户开放”来限制日本，保持美英在远东和亚洲的霸权。报告书提出：“为了保证对满州发展有利害关系的强国之间的合作，则维持‘门户开放’的原则，不但从法律观点上看来是必要的，就是在实际活动中，如在商业、工业以及银行事务的活动中看来，也是必须如此的。”报告书认为，实现“门户开放”的原则，其方式是在整个军队里任命可

以监督中国财政、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外国顾问。报告书主张中国东北实行高度“自治”，由帝国主义来共同统治。这是对日本独霸亚洲野心的限制，又是对美英亚洲霸权的维护。

总之，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的基本点就是反苏、反共，又以拍卖中国东北来鼓励日本“北进”；用“门户开放”来遏止日本“南进”，来保持美英在亚洲的霸权。由此可见，该报告书是一份绥靖主义的代表作，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美英所实行的绥靖政策，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就受到苏联、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批判。“真理报”在揭露报告书的目的是指出，报告书“企图制造日苏冲突，并且为了卫护全体帝国主义分子的共同利益而妄图为帝国主义的协同反对中苏打下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李顿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州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明白地宣布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州、华北、上海是正当的不得已的行动。号召各帝国主义都来瓜分中国，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联行政院开始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但没有任何结果。十二月初，国联召开特别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英国代表西门在发言中提醒人们注意报告书中的这一点，即“完全恢复事变以前的原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不仅拒绝对日本采取制裁行动，而且还不承认日本在满州有侵略行为。西门的演说深得日本的赞赏，日本驻国联的代表松冈声明说：“我打算用十天来表达的东西，西门只费半小时就说清楚了。”

尽管美英把中国东北分脏给日本，但日本侵略欲望之大，是独霸亚洲，称霸世界，它侵占东北而不受惩罚，争霸而不受制裁，胆子愈来愈大，所以它对美英奉送的这点“礼物”根本不屑一瞥，断然拒绝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日本攻占了重要战略据点山海关。山海关是连接中国东北与内地的门户，日本占领山海关，表明日本“南进”之势已成，它对美英在华利益造成了更严重的威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二月二十四日，国联大会讨论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之后，举行了表决，除了日本反对以外，一致通过了报告书。国联大会在通过报告书的决议中，一再迁就日本，讨好地提出：“并非仅求恢复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之原状”。但仅仅因为大会要求会员国不要承认伪“满州国”，便使日本感到国联的决议碍手碍脚，日本希望独往独来，称王称霸，而不受任何限制。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此后，它更是有恃无恐，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一九四一年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使日美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搏斗达到了顶峰。

日本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发动的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以及日本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绥靖主义者本身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祸水的冲击，中国人民、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不得不付出空前的代价，——所有这些恶果，都不能说不同绥靖政策有着密切联系，这深刻的历史经验我们决不能忘记。